

书评

## 看宋韵文化下的宋代世族

何忠礼

如何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我认为推动学者对宋代世家大族进行年谱研究很有必要,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解码浙江历史文化的源头。

最近,笔者拜读了由浙江财经大学姚红教授编撰的《宋代东莱吕氏家族年谱长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得益良多。该书以82万字的篇幅,分上中下三编,系统地阐述了东莱吕氏在宋代二百年间在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等领域的主要成就和历史性贡献,旁及吕氏家族的姻亲及主要交游关系,对于认识宋代的世家大族与唐以前世家大族的不同,以及它对宋韵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来说,更具典型意义。

东莱吕氏是两家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世家和学术世家之一,时间绵延之长,则为有宋之最。

祖籍为山东莱州的吕蒙正(946-1011年)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考取进士第一名,成为一代名相,到八世孙吕祖谦(1137-1181年)作为一个著名的理学家和文史学家,于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去世,共历时204年。

该家族世代簪缨,相继执七朝政,南宋学者王明清不无赞叹地说:“吕文穆相太宗。犹子文靖参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为英宗副相,为神宗枢密;次子正献为神宗知枢,相哲宗。正献孙舜徒为太上皇右丞。相继执七朝政,真盛事也。”北宋后期党禁,吕氏家族虽在政治上一直走向衰微,但在文学和学术领域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六世孙吕本中(1084-1145年)在北宋后期不仅主盟诗坛、首倡诗派之说,还是理学先驱,是两宋之交思想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宋室南迁,东莱吕氏也随之来到了浙江。吕本中的堂孙吕祖谦与朱熹、张栻在南宋时被称为“东南三贤”,他也是大家公认的文章大家。由于吕祖谦对理学所作的突出贡献,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得以配享孔庙。

这是一个有着浓郁宋韵文化特色的显赫世家,此前并没有人以年谱的形式从家族层面对其事迹作系统的梳理。该书告诉我们,从吕蒙正开始,与东莱吕氏家族联姻的有几十个家族,大多是当朝宰辅家族,在现实社会政治中拥有重要权力,或是衣冠旧家,在社会中仍享有较高声望。该书年谱长编十分关注东莱吕氏的姻亲关系,通过姻亲关系可以考察吕氏家族的人际网络以及宋代“榜下捉婿”的独特风俗。

宋韵文化的核心思想是理学,宋代文化的意与韵根植于独到的哲学之中。东莱吕氏家族为宋代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吕蒙正的侄子吕夷简擢升夷(962-1033年)等人以经义辅导仁宗,使仁宗成为经学修养极高的皇帝,宋代儒学复兴在仁宗朝,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如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等,大胆疑经,发明义理,这是理学的开端。

历史对吕夷简的功过虽评价不一,但他忠心辅君,不谋私利,功不可没。吕夷简三子吕公著(1018-1089年)是吕氏入《宋元学案》的第一人,为当时名儒。他遍交天下学人,对理学的几个开山人物如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爱护、提携有加,作为元祐宰相,吕公著是“元祐学术”的积极推动者。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乾淳年间(1165-1189年)当之无愧的学术领袖,浙东学派的创始人。他著作等身,规模宏阔。吕氏家族登《宋元学案》者达七世二十二人之多,今人以“空前绝后”来形容吕氏家族人才之盛,似不为过。

宋韵文化的一个突出内容是家风家教。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良好的家风家教才能让家国情怀厚植于人们的心田。

吕夷简曾勒门铭教育子女,其门铭云:“忠以事君,孝以养亲。宽以容众,谨以修身。清以轨俗,诚以教民。谦以处贵,乐以安贫。勤以积学,静以澄神。敏以重用,直以全真。约以奉己,广以施人。重以临下,恭以待宾。贯之以道,总之以仁。在家为子,在邦为臣。斯言必践,盛德丰新。”

此门铭流传于后世,陆游甚至认为可以以孔子的“思无邪”三字铭相替并论。清乾隆帝朱轼《史传三编》卷四七认为自汉以来家法最著者,东汉杨氏、唐柳氏、宋吕氏为首称,高度评价了吕氏家族家风建设的成就。

总之,通过这本书的系统介绍和研究,不仅了解到东莱吕氏对宋韵文化的传承所作出的贡献,而且了解到世家大族在宋朝的政治生态下,其所起作用与唐以前世家大族的不同,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

# 《自我突围》出版 当施一公打开“施一公”

本报记者 严粒粒



1990年4月2日,奶奶蒋炜、爷爷施平、母亲姜小英、姐姐施云楠(从左至右)在上海虹桥机场送施一公赴美留学。 中信出版社供图

施一公之所以成为施一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选择”——

35岁时,他成为美国常春藤高校——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最年轻的终身教授;41岁时,他放弃美国终身教职,全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48岁时,他成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却在不久后辞职,从零开始去“创业”;51岁时,他投身创办的西湖大学获教育部批复成立。施一公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校校长。

这些“选择”的理由,藏在了施一公近日出版的首部作品《自我突围》里。似一部自传,施一公分享了他的家世、成长、师友故事,以及在教育和科研事业上的经历和观点。其中不少内容是首次披露。

书开书间,我们将通过施一公的所思所想,识别出一个当代中国科学家的人生观。这时,我们看到的似乎又不止是一个“施一公”了。

1

施一公说:“游子归乡,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报效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这是最自然不过也最让人自豪的成就感!”

2008年,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施一公拒绝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资助,全职回归母校清华大学。

消息传来,哗然一片。

《纽约时报》曾在名为《逆势而上——中国吸引海外科学家归国》的报道中开篇就用施一公作为例子。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著名教授罗伯特·奥斯特则表示:“他是我们的明星,我觉得他完全疯了。”

是什么,让一个中国人“最自然不过”的“回家”之行,成为舆论焦点?

也许,因为时代变了——

回顾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有以容闳、严复、秋瑾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留学生推翻帝制;有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留学生点燃中国革命的火种;有以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茅以升等为代表的第三代留学生寻求科学救国之路;第四代留学生则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奔向苏联学习先进科学技术……

改革开放后,施一公和众多的第五代留学生已经站在崭新的中国。他们仿佛不再需要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是吗?施一公当然明白,什么是世俗的“成功”:“回国前,吃的、穿的、用的,房产、汽车,我都有了,学术地位、荣誉奖项,我也有了,我还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在几乎所有不了解我的旁观者眼里,我已经完美实现了所谓的‘美国梦’”。

可是,他却心心念念想要“回家”,去成为祖国巨变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此后,从回到清华大学,到创建西湖大学,施一公所做的每一个人生重大决定,都是围绕着国家所需。

一个人的抉择,最令人动容的地方,正是在巨大利益面前的取舍。这是“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博弈。

的确,时代在变。国家日益强盛,百姓日渐富裕。出国留学,不再是少数

家庭的选择。“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也是中国多年来的留学政策。

但时代也变得复杂。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亦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打开了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争夺的机会窗口。

施一公在书中提及,早在2008年,他关注到“美国科学开始衰退”的说法在国内广泛流传。当时他就清醒地指出:“美国科学之强大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它不仅仅没有衰退,而且会在今后几十年内很强势地引领世界发展。”

字字警铃。

中国正在面临许许多多的“卡脖子”技术问题。现实告诉我们,新时代科技强国建设,迫切地呼唤着更多愿意投身国家发展的科学家。

这种迫切感,丝毫不比从前弱。从这个意义上,“海归”施一公延续了老一辈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矢志报国的精神。他亮出了一群人的底色。

2

回到科学竞争的话题。诚然,刻苦是成功科学家的硬素质。施一公在书中强调,“时间的付出是必须的”。你完全可以从他分享的工作安排上识别出他的勤奋。

然而,创新才是科学的本质,是科学家精神的灵魂。从过去的“两弹一星”到如今北斗导航、“嫦娥”奔月、量子科技,无不是靠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取得的。

当下,中国的科技创新做得还不够。施一公在书中特别提到“钱学森之问”。2005年,钱学森在晚年发出感慨:“那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问的是人才,也是创新。这个问题,萦绕至今。

书中,施一公专门撰写了一篇《试答钱学森之问》。他认可高考是非常适合中国国情的“最公平的选才模式”,承认自己也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在美国读博士时,他一度跟不上生物课,成绩几乎到了不及格的边缘,是应试教育打下的数理基础支撑他恢复信心。

但是,事有两面。在美国,施一公运用应试教育的解题思维,学业事业一路高歌猛进。然而,当他拿到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之后,却开始惴惴不安。

他开始反思:“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寻找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深入我的每一个细胞,即便在博士毕业之后的独立科研生涯里,我仍然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常常选择相对保守但回报较为丰厚的研究课题。”

但科学研究的前沿,恰恰是那些前途不明、具有高风险性的领域。保守地选择“追尾巴”“照镜子”的科研方向,注定将永远落后于人。施一公决定“以身作则”。

回清华之时,不惑之年的他“把大部分力量用来投入崭新、高风险、没有任何成功把握但激动人心、令人痴迷的研究方向”,即便“任何一个都没有哪怕5%胜算”。

的确,创新意味着冒险,冒险就意味着失败的风险不可测。2008年到2011年期间,当4个主要方向全部折翼时,施一公在挣扎焦虑中,认真考虑过退却,最终却依然选择在“妥协”中前进。

他调整策略,专攻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1个领域,终于在2013年开始收获突破性进展。2023年初,西湖大学施一公团队又在该领域取得重大原创发现——找到了可能触发阿尔茨海默病记忆衰退的“机关”。

这一发现意味着,也许未来,阿尔茨海默病有效的治疗药物将不再是“零”。

创新就像是一条发掘宝藏的路。宝藏注定珍稀,挑战注定巨大。



《自我突围》书封。 中信出版社供图

3

如果说,科研创新首先在于做好自己。施一公的心里,则远不止只做好自己的。比如,他参与创办的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这里需要引出一个概念:战略科学家。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所谓战略科学家,具体而言,是具有深厚科学素养、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的科学家。

他们中,有的深藏功名,埋头苦干,以突出的科研成果“追平”西方百年科技发展进程;有的则可以从宏观层面上,为国家科技决策提出具有前瞻性、可实施性的建议。

书中,专门有一章“科教心得”板块。《教育改革的支点:高校自主权》《引进高层次人才时不我待》《论中国核心竞争力:人才》等文章,有理有据地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的不足和解决路径。突破科研创新落后的关键点,也许就在体制改革上。

2015年3月,施一公、陈十一、潘

## 中国首部通史类浙江古代青瓷专著《浙江古代青瓷》出版 温故知新,青瓷的鎏金岁月

本报记者 林婧

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特别是青瓷生产经历整整三千余年的赓续,几乎贯穿有文字记载的整个中国古代史。三千年前,湖州东苕溪流域的先民们以较纯的瓷质黏土为原料,在超过1100℃的窑火中成功烧制出色泽呈青的原始瓷,也就是原始青瓷。

春秋末至战国早中期,原始青瓷的生产也伴随着越国国力日益强盛而达到巅峰,器形规整匀称、通体施釉,厚薄均匀。这时的原始青瓷已经与当前普遍认知的瓷器形制上相差无几了。

随后,在东汉至中晚期的浙东地区,主要胎釉特征符合现代标准的成熟瓷器诞生了。与此同时,一个将在往后引领全国乃至世界潮流千年的青瓷系统开始逐渐形成——越窑登上历史舞台。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唐代文学家陆龟蒙笔下秘色瓷的神姿。南宋初赵德麟《侯鲭录》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秘色瓷这个谜团长期未能解开。直到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了13件制作精美的唐代青瓷,同时出土的衣物帐簿明确称之为“秘色瓷”,人们才恍然大悟,秘色瓷就是越窑青瓷中的极品。

如果说汉六朝至北宋的浙江青瓷,以越窑为代表的话,那么南宋到明清,则是龙泉窑独步天下的时期。这时,“粉青”“梅子青”后来居上,特别是“粉青”逐渐取代“秘色”,成为上品瓷器的代名词。同时,浙江古代青瓷生产不仅满足国内强劲需求,还远销海外。

在16世纪的法国,第一次见到龙泉青瓷的法国人难以用词汇描述其温润如玉的质感,便用当时流行的戏剧《牧羊女》中主人公塞拉同的华美青色演出服来比拟。塞拉同,至此也成为了青瓷在海外的“昵称”。

在失去宫廷青睐后,盛极一时的浙江青瓷,在明代中期以后一度逐渐式微。纵观浙江古代青瓷的发展脉络,有辉煌的巅峰,有困顿的低谷,好在绵延千年从未中断。

事实上,要将浙江古代青瓷的千年故事理顺脉络,娓娓道来并非易事。如何开始起笔呢?在将近一整年的反复酝酿中,作者们终于确定了整部专著的建构框架和行文逻辑:以浙江古代青瓷发展历史为主线,划分出滥觞期、成长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等五大历史时期;以官窑系中的“官”为轴线,还原贡瓷、官窑和哥窑的演化历程;以产品输出和工艺传播为次轴线,介绍青

瓷流布与技术辐射的范围。

“万事开头难,最难的是要排除干扰、专注写作。”郑建华表示在完成公务之余还要兼顾写作进度往往让人力不从心。为此他只能给自己“立规矩”,在节假日期间快马加鞭,全身心投入。

三位作者将考古资料作为基础,以窑址考古材料为主,辅助文献史料,充当《浙江古代青瓷》的丰厚血肉。同时,他们还分析借鉴了陶瓷科技考古成果,在追求论证的逻辑性的同时,也保证结论的严谨性。

资料显示,以南宋为节点,浙江青瓷有了釉层变厚的趋势,同一时期出土的青瓷中还出现了仿青铜礼器的器形和非传统的装饰风格。转变从何而来?叶喆民曾在《中国陶瓷史》中提出,汝窑青瓷与越窑有密切关系。

对于郑建华而言,仅仅参考相关研究的文字和图片材料远远不够。他先后两次前往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三次到访汝州张公巷窑址,从考古实物入手,在与当地学者的一次次交流中抽丝剥茧,力求廓清整个脉络,确保其准确性。

国人爱玉,并赋予其祥瑞和美好的象征意义,更将其喻为德行,视为审美。最初将人文精神和审美态度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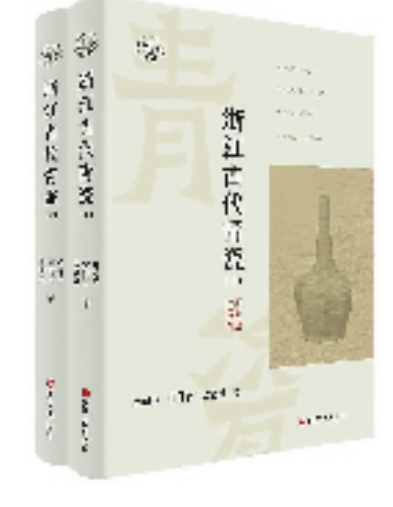
于青瓷的,正是古代文人阶层。作为古时精品瓷器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他们长期的文化熏陶、人生体悟和诗歌情怀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影响着瓷器生产。

郑建华告诉记者,在唐朝中晚期大量讴歌越窑青瓷的诗文出现,它们大多从饮茶方式和饮茶器具的角度来追捧越窑青瓷。

崇尚茶文化的文人生活,也在同时期催生出口日渐丰富的越窑茶具器型。上世纪七十年代,宁波市和义路码头遗址就出土了一件茶盏似五瓣荷花绽放、盏托似荷叶边缘微卷的“越窑青瓷荷叶托茶盏”。除了相映成趣的茶盏托,还有制作精巧的茶匙。

在明朝中后期逐渐衰落的龙泉窑在新中国得以重生。1957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青瓷生产。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已有2万余人从事龙泉青瓷行业,其中有5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47位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

青瓷,早已成为当下浙江青年生活的一部分。新旧之交,在书架上细数生齿,围下瓷虎煮茶,挽执青瓷杯分尝醇香味……古今交错中,窑火不灭,青瓷不老。



作为我国最早瓷器制品,青瓷肇始于夏商之际的浙江。2019年,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之“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课题立项,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两位馆员谢西营、张馨月从考古烟海的考古和研究成果中爬梳剔抉、访古纳新。

现如今,中国首部通史类浙江古代青瓷专著《浙江古代青瓷》已静置案头。轻轻翻阅,那纸页之间流淌的沙声是千年青瓷叩响文明的大门。

浙江古代陶瓷在中国和世界陶瓷